



Analysis on Death Consciousness in *Chanson Douce*

Ding Houz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China

Email address:

995035410@qq.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Ding Houze. Analysis on Death Consciousness in *Chanson Douc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1, 2022, pp. 1-5.

Received: May 10, 2022; **Accepted:** May 23, 2022; **Published:** May 31, 2022

Abstract: Leila Slimani is an outstanding contemporary Moroccan-French female writer and a rising star in French literary circles. *Chanson Douce* is her second novel, which received rave reviews after its publication and therefore won the 2016 Goncourt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France. This novel narrates a tragic story of a middle-class French couple who hired a nanny and constantly had small and trivial conflicts with her in their daily life, which has led to the nanny's nervous breakdown, the failed suicide of the nanny and the murder of two children of the couple. This tragedy reflects the complicated soci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France. In this work, with her cold, incisive, sharp writing style, the author directly shows the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such as class gap, spatial violence, sexism, etc, faced by a certain group in French society—the nanny. Through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language style and plot setting of *Chanson Douce*, reveal the author's concept of death, and explore root of the tragic incident of “Nanny Killing Children”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novel on our perspective on the problem of class gap in the current French society.

Keywords: *Chanson Douce*, Death Consciousness, Leila Slimani, Current French Literature

《温柔之歌》中的死亡意识刍议

丁厚泽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南宁，中国

邮箱

995035410@qq.com

摘要: 蕾拉·斯利玛尼是当代杰出的摩洛哥裔法国女作家，是法国文坛的后起之秀。《温柔之歌》是其第二部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获得了2016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这本小说讲述了一对法国中产阶级夫妇雇佣保姆后不断发生细小，琐碎的矛盾冲突，致使保姆精神崩溃，而后残忍杀害两名幼童并自杀未遂的悲剧性故事。这一社会性的悲剧反映出了法国当下的种种问题。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冷峻，犀利的文笔直白地展现出保姆这一群体在法国社会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如阶级差距，空间暴力，性别歧视等。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温柔之歌》中的语言风格和情节设置展开分析，揭示作者蕾拉对待死亡的观念，并从社会的角度上探究“保姆弑童”这一悲剧的真正根源，以揭示该小说的主题思想对我们透视当下法国社会中阶级差异问题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温柔之歌》，死亡意识，斯利玛尼，当代法国文学

1. 蕾拉·斯利玛尼与《温柔之歌》

蕾拉·斯利玛尼(Leïla Slimani)于1981年出生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拥有法国、摩洛哥双重国籍。她的父亲是摩洛哥人,曾担任摩洛哥政府经济部长,后来成为了当地知名的银行家。而母亲则有法国和北非阿尔及利亚双重血统,是摩洛哥第一批女医生之一。蕾拉家境优渥,从小就对文学作品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与热爱,在阅读过程中主要受到了茨威格和契科夫的影响。尽管自蕾拉出生到上大学前一直在摩洛哥生活,但她一直用法语和双亲交流,法语水平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这为其日后用法语写作奠定了基础。17岁的时候,蕾拉来到法国读大学,在巴黎政治学院攻读政治学专业。[7]求学过程中开始逐渐认识到女性的生存困境,法国社会中贫富差距,阶级固化及种族矛盾等问题。而后蕾拉又去法国商校求学,攻读传媒专业。蕾拉因而有机会能在报社实习,后来成为《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的职业记者。2014年,蕾拉以女性瘾者为主题的小说《食人魔花园》(*Dans le jardin de l'ogre*)使其在法语文学界崭露头角。2016年,这位法国北非裔女作家出版了第二部小说作品《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这是一本关于当今职业女性日常生活的小说,首先提及了那些打拼事业的同时也是母亲的女性,书中还谈到了女主角路易斯人性深处的绝望,阶级斗争,以及寻求身份的问题。[1]这部作品荣获龚古尔文学奖,并很快得到了法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出版一年后销量超过六十万册,版权售至37个不同的国家。在2017年,斯利玛尼被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为全球法语推广大使,成为了“代表着法语国家对多元文化世界的开放面孔”。

《温柔之歌》讲述了一个保姆弑童的悲剧故事。女主人公米莉亚姆是受过一名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她拿到了律师证,大学刚毕业,正是追求事业的好时候,可因为结婚生子,不得不放弃事业。全职太太的生活十分枯燥无聊,米莉亚姆不愿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便和丈夫保罗商量,计划重返职场。考虑过后,这对夫妻决定雇佣一名保姆来照顾两个孩子,于是就遇到了路易丝,一个如同“仙女”般精明能干的保姆。路易丝来到米莉亚姆的家中,细腻的照顾孩子,洗衣做饭,收拾家务,轻松完成了之前夫妻俩疲于应付的家庭工作,完美地解决了夫妻俩的烦恼。而保姆路易斯却在此期间感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压力——阶级的差距,失业的风险,及人生价值的局限等。种种刺激与拘束下,路易斯日渐忧郁,乃至变态,最后杀害了雇主家的两个孩子。

《温柔之歌》的创作灵感首先与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作为女作家,蕾拉也遇到过职业与家庭难以平衡的问题,也雇佣过保姆照顾孩子,遇到过较为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第一个保姆需要照顾我的儿子和侄女,他们两个年龄相仿。有一天,这位保姆跟我说,‘我从一开始就对你撒谎了。我告诉你的名字不是我的真实姓名,我给你看的身份证也不是我的真实身份证。’我姐姐和我当时都还小,甚至不到30岁。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这个照看我们孩子的保姆一无所知。有时她会和孩子们出去玩,我们会给她打电话,但是却联系不到她。或者她会很晚才回来,我们都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们那时候什么都不敢说,因为我们太天真也太愚蠢了。”[6]这段亲身经历使得蕾拉开始

关注保姆这个题材,逐渐发掘出这个群体所面对的现实压力与困境。

而创作《温柔之歌》更为重要的源泉是两件社会中真实发生的保姆弑童事件。其一是二十世纪末震惊美国社会的“少女杀婴案”。1997年2月9日,一名年仅8个月的男童惨死家中,经法医鉴定,死因是其头部遭受了猛烈重击。案发时只有保姆路易斯·伍德沃德和两名男童在场,雇主夫妇据此指控保姆谋杀了他们的孩子。《温柔之歌》中路易丝的名字便取材于此。另一真实事件则发生在2012年的美国纽约市,一名多米尼加裔保姆因与雇主的纠纷,残忍地杀害了她所照看的两个孩子。报道中有一张保姆与全家人的合影和雇主形容保姆的一句话,“她是我们家的一份子。”[12]这给蕾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现实中的惨案发生在美国,但出于法语作家的身份,她将故事发生的场地转移到了她更为熟悉的巴黎。正如蕾拉接受采访时说道的那样:“将小说的位置定位于巴黎使我必须重塑整个的故事”。[9]《温柔之歌》的创作来源便在于此。

2. 《温柔之歌》中的死亡意识

生与死作为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是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中永恒讨论的主题。文学中出现了死亡主题也就出现了作家对死亡的认识和观照。[15]对死亡的思考贯穿在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和文学创作史的长河中。“死亡是生存的事实,生存状态的事实,死亡意识则是一种意识事实。”[14]死亡意识,简单来说就是针对死亡的观念看法。具体而言,死亡意识就是指“关于死亡的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活动的总和,既包括个体关于死亡的感觉、情感、愿望、意志、思想,也包括社会关于死亡的观念、心理及思想体系。”[11]在《温柔之歌》中,死亡意识主要体现在对待死亡的冷静客观态度上。作者从多方面暗示了保姆弑童,造成两个幼小生命的夭折的结局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下的必然结果,是无法改变,无法逃避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有二,其一是以像新闻一样去感情化的笔调记录了两个幼儿死亡的惨痛场面,其二则是设置了保姆弑童这一犯罪情节。本章将从这两个角度来探讨《温柔之歌》中的死亡意识及其具体体现。

2.1. 冷静客观的悲剧语言

如果说福楼拜因出身医身世家,从而语言风格冷静的像一把手术刀的话[2],那么有过记者履历的蕾拉语言风格则是像社会新闻的镜头一样只着力于转述事实,而不掺杂个人的情感。小说一开头,已然将悲剧的结局揭示给读者:“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小姑娘双眼暴突,似乎在找寻空气。她的喉咙口全是血。肺部被刺穿,脑袋曾经遭到激烈的撞击,就撞在蓝色的衣柜上。”[13]这段对犯罪现场的描述中,并未使用过多具有感情色彩的词汇来展现两个儿童惨遭毒手的悲剧画面。法语原文的开头甚至比中文译本更为简洁冷峻:“Le bébé est mort.”[8]作者通过倒叙的手法,将这出悲剧娓娓道来,为我们展现了曾经被视为理想保姆的路易丝是如何在社会阶级的矛盾和生活的冷漠艰辛中一步步走向毁灭的。[10]《温柔之歌》中描绘死亡的方式就像一台摄影机一样,呈现的仅仅是客观的,血

淋淋的画面。读者像观看一则社会新闻一样, 跟随着摄像机不带感情的视角目睹着屋内发生的一切, 包括“公主图案的拼花地垫上浸透了鲜血”, “玩具都被装进透明塑料袋里封好”, “甚至蓝色衣柜也将会成为呈堂证物”。[13]不难发现这一段文字中呈现画面的顺序与真实的新闻报道如出一辙。事件最后的结果也轻描淡写地像两个新闻标题。“亚当死了。米拉奄一息。”在这些文字中, 我们看不到作者的同情或者哀伤。在她的笔下, 尸体就是尸体, 仅此而已。

凶行已结束, 而后向我们呈现的便是母亲面对惨状, 濒临崩溃的场景——“进入房间, 看见孩子们倒在地上, 她发出一声低吼, 如母狼一般深沉的吼声。连墙体都为之颤抖。”[13]这段叙述虽然展现出母亲悲痛欲绝的精神状态, 但作者并未因此而开展针对角色个人的感情描写与心理描写。这一段落中呈现母亲的崩溃与悲痛主要依靠的是母亲客观的行为及他人对其行为的反映。读者依旧是像在小荧幕里看一则新闻报道一样注视着这一真实的画面。[4]先是母亲泣不成声, 后是警察, 记者对此的记录与报道。再是母亲被残忍的现实击溃, 无力接受现实诱发的种种崩溃的言行举止。“孩子们的母亲受到很大刺激。救援队员是这样说的, 警察是这么说的, 记者也是这么写的。”“她吐了, 警察看到她的时候, 她就在吐, 她的衣服全部湿透, 瘫倒在房间里, 疯子一般, 泣不成声。吼声撕心裂肺。在救护车的急救人员谨慎示意下, 人们不顾她的反抗和拳打脚踢, 将她拉起来。他们慢慢地抬起她的身体, 急救中心的实习生给她服了一片镇静药。”[13]女主人公面对孩子夭亡激烈的反应与作者冷峻的语言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更让人有目睹真实的社会事件之感。

案发现场清晰的呈现完成后, 镜头终于来到了行凶者身上: “她切了自己的两个手腕, 喉咙口也插入一把刀子。她仍在昏迷, 倒在婴儿床下。人们把她竖起来, 给她测了脉搏和血压。然后他们把她放置在担架上, 年轻的实习生用手支撑着她的颈部。”[13]行凶者已然得手, 然而自己却自杀未遂, 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她只知道怎么送别人去死。”至此整个事件过程基本明晰, 一对幼儿被杀害, 母亲发现后彻底崩溃, 犯案者杀人后再试图自杀。然而至此, 作者对犯罪者的身份毫无提示, 只是简简单单称其为“另一个女人”, 看不出任何作者的斥责或同情或愤怒。

总之, 作者并未从遇害者、目击者、行凶者中任何一个视角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地去描述小说中涉及死亡的情节。因此, 这种取消审美情感的语言确立了人物死亡过程的现实性。置身事外的冷静语言, 如同新闻报道一样, 直接了当的告诉了读者这件惨案是社会中的客观事实。也就是说《温柔之歌》中体现的对待死亡的态度就和警方去犯罪现场取证的态度没有什么区别。死亡, 在他们眼中是既定事实, 既然无法改变惨痛的结局, 便只有冷静客观的面对, 并思考导致惨案发生的原因。

2.2. 弑童情节的设置

从情节上来看, 《温柔之歌》的开头便将保姆弑童的悲惨结局揭示给读者, 小说中死亡意识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此。保姆为了避免承担失业的后果, 为了挽救自己不堪的生存状况, “不得已而为之”的杀死了两个幼童, 在行凶

得手后便打算自杀。作者做了不少铺垫, 暗示路易斯弑童的原因, 特别是在塑造路易斯的人物形象上。路易斯从早期刚到米莉亚姆家的温柔体贴, 到中期慢慢显示出了精神失常与内心的阴暗, 再到最后完全崩溃绝望, 只得通过杀人来一了百了, 从“温柔”变得“绝望”的过程既解释了路易斯犯罪的心路历程, 也使得整个故事得以流畅的进行下去。无论是从心理渐趋变态的保姆的视角, 还是作者宏观的情节设计上, 弑童在本书中都显得十分必要。正如路易斯在小说后半段中自言自语地说道: “必须要有人死。有人死了, 我们才能幸福。”[13]因此, 在《温柔之歌》中, 死亡是注定的, 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下无法避免的结果。故《温柔之歌》中死亡意识也体现在弑童情节的设置上。

实际上, 在《温柔之歌》中, 所有的情节也都是围绕“杀人动机”展开的。正如斯利玛尼本人所言, 读者能从头到尾地见证保姆抑郁得快要发疯的过程。路易斯身上的阴暗面最开始是在给米拉的讲故事的情节上显现出来的。路易斯讲的故事十分残忍。“她讲故事, 日复一日, 故事里都是同一类人物。孤儿, 迷路的小姑娘, 被囚禁的公主, 吃人妖魔丢弃的城堡。……但是, 这些残忍的故事——好人在拯救了世界之后最终都会死去, 她究竟是在哪片黑暗的湖里或是哪片茫茫的森林里钓上来的呢?”[13]作者在此暗示路易斯的心里有一片“黑暗的湖”或一片“茫茫的森林”, 仿佛是为其日后杀人埋下伏笔。

在私人生活中, 路易斯身上的人性黑暗表现的更加一目了然。与在雇主家精心呵护孩子相反, 她对亲生女儿斯蒂芬妮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甚至施以暴力。“路易斯抓住她的袖子, 用了很大的力气, 也很粗暴, 让人难以置信。一种越来越阴郁、越来越炽热的愤怒在路易斯内心蔓延开来。她想将自己的指甲深深插入女儿柔软的肌肉。”“才关上入户的小门, 她便开始揍斯蒂芬妮。开始是她的背, 拳头上, 女儿被掀到了地上。女儿蜷缩起来, 大声叫喊。路易斯继续揍她。体内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手虽小, 抽在斯蒂芬妮脸上的耳光却毫不含糊。”[13]平日温柔耐性的保姆回到家中会立刻失控, 难以抑制自己的负面情绪, 开始虐待自己的女儿, 巨大的反差显示出其岌岌可危的精神状况。

这种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随着情节推进变得更加严重, 也就解释了小说中两个孩子的死亡为何是不可避免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可怜保姆无依无靠, 在多方刺激之下, 心中的“绝望”终于难以掩饰其整日费力伪装出来的“温柔”, 于是杀人的想法便油然而生。作者多次对路易斯脆弱心理描述使得小说情节必须以弑童为前提。因为只有路易斯杀人, 我们才会探索其杀人动机。而一旦了解了她的动机之后, 就会理解其受到的多方压力多重困境。杀人, 在路易斯绝望的生活里, 是为数不多的可把握的突破口。作者通过情节的演进揭露了保姆脆弱的心灵世界, 并冷静地表述了她的死亡观: 弑童是路易斯不可避免的宿命, 无力抵抗更无法避免。

3. 保姆弑童的社会根源

文学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 因此常被视为反映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温柔之歌》中保姆路易斯弑童的悲剧来

源于社会真实发生的凶杀案件，也反映出社会中存在的矛盾的现实问题。2017年，《温柔之歌》中译本在中国出版。而同年的6月，新加坡一名印尼女佣杀害雇主夫妇的新闻同样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类似的事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早有发生。从震惊国际法庭的2012年法国华人保姆灭门碎尸案，到2018年美国怀孕保姆杀婴案，资本主义国家内类似的罪案不胜枚举，这证明此类罪犯是真实存在并长期以看似温柔的面孔藏匿在万家灯火之中的。

因此，不难发现，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这样的保姆杀人案件都不是偶然的，是有其背后的社会根源的。这类凶杀案集中体现了社会深层的矛盾——贫富差距及阶级固化。这些社会问题在保姆这个职业群体身上的体现正是迫使小说中的路易斯走上行凶道路的最根本原因。《温柔之歌》中路易斯犯案的动机十分滑稽荒唐，但却是有其社会根源值得探究的。《温柔之歌》中，米莉亚姆的小儿子即将上幼儿园，因此不再需要雇佣路易斯。即将失业的路易丝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将变得更难忍受。她依旧要负担已故的丈夫的高额债务、无力承担的房租并继续独自生活的极度压抑孤独的精神状态。于是，身处困境中的路易斯，自认走投无路。疯狂，偏激甚至变态的念头就此产生——杀了米莉亚姆的一对儿女，她就会继续生孩子让自己照顾，路易斯就不会失业，其他的后顾之忧也自然烟消云散了。路易斯因为荒诞的杀婴行为而成为另一个法国文学中经典角色的影子，即加缪笔下的默尔索的影子。[5]这种想法在常人看来确实十分荒唐，但站在保姆的角度来看，走投无路又无所依靠的状况下，产生失智又疯魔的念头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小说前段中，路易斯工作尽心尽力，照顾孩子无微不至。她精心照料着这个家庭，如同仙女一般。[3]米莉亚姆一家赞不绝口，对路易丝的机敏能干，心灵手巧十分满意，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信任她。但由于阶级差距，即便受到过高等教育，米莉亚姆这位同为女性的雇主也从未发自内心的平等看待路易斯，甚至对她的人格都谈不上基本的尊重。源自阶级差距的种种矛盾就日积月累的在小小的四口之家中使家中的“局外人”——保姆路易斯寒了心。

比如，路易斯刚来不久就大花心思筹备米拉的生日会，而米莉亚姆彼时正忙于自己的工作，无心为此多费心思。“米拉生日会的筹备已经超过了米莉亚姆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两个星期以来，路易斯就只有这一个话题。晚上，米莉亚姆工作结束精疲力竭地回到家里，路易斯把自己制作的花环拿给她看。她还用一种带着神经质的声音和米莉亚姆说起在一家小店里看到的塔夫绸裙，说她敢肯定，米拉穿上它一定美疯了。好几次，米莉亚姆都强忍住才没有粗暴地打发她走。”[13]这一情节直接体现了这对雇主与保姆之间的隔阂与冲突。米莉亚姆年轻上进，以打拼事业为主要追求，因此对诸如米拉生日会之类的家庭中的琐事不愿太上心。而这些米莉亚姆瞧不上眼的家庭琐事却是保姆路易斯工作乃至生活的核心部分。

类似的矛盾与冲突在保罗和米莉亚姆一家带上路易斯去海边度假时首次达到高潮。路易斯不会游泳，无法陪他们的女儿米拉去水里玩，而这惹恼了米拉也使得夫妇二人十分尴尬。“保罗感到很尴尬，而这尴尬又让他感到恼

火。他恨路易斯，非要把她的贫困、她的脆弱一并拖到这里来。一副殉道者的表情，毁了他们美好的一天。”[13]小说中还多次提及路易斯节俭到了让并不富裕的雇主都无法忍受的地步，她教孩子舔干净酸奶盒，费心寻觅五花八门的折扣券，而雇主夫妻非但不领情反觉得这些举动既可怜又可笑。“每次看到路易斯聚精会神地研究放在信箱上的各种宣传小册子，他们也觉得有趣，那些都是街区各种各样的商店发来的促销小册子，他们基本上看都不看就会扔掉。”“但是几个月后，这种癖好就成了压力。米莉亚姆指责路易斯有强迫症，指责她过于严苛，过于偏执。”[13]而造成路易斯与米莉亚姆一家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便是“鸡架事件”：米莉亚姆把已经变质的烧鸡扔了，而路易斯却把鸡架捡回来喂给米拉吃，甚至出于报复心理地将鸡架放在了在厨房的桌子上。这吓坏了晚上下班回家的米莉亚姆。“整夜，米莉亚姆都在想放在厨房桌子上的那鸡架。只要一闭上眼，动物的骨架就浮现在她面前。它就在那里，在她身边，在她床上。她一下子喝光了杯中的葡萄酒，手放在桌子上，眼角的余光扫视着那具鸡架。她不想去碰它，不想感受到碰触它的感觉，觉得很恶心。”[13]

以上的情节反映了米莉亚姆一家和路易斯因为贫富差距而产生的种种分歧，冲突与矛盾。日复一日的冲突击垮了路易丝的心理防线，唤醒了其灵魂深处的阴暗面，从而酿成了弑童的悲剧。“路易斯来到保罗和米莉亚姆的家，她按照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保罗的家庭。但是她还算清楚，这种生活方式的旁观者与这种生活方式的拥有者之间的界限。……直到她开始暗暗地尝试跨越自己与雇主家庭之间的界限，悲剧才悄然拉开了帷幕。”[17]在一个国家中，底层人民如果缺乏上升路径，在自己的生活中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就会对社会环境充满仇恨与失望。同时在消费社会背景下，在物的包围中，阶层间差异表现得更加明显，阶层冲突也不断加剧。[16]面对着无望的前途与生存的压力，毁灭他人与自我毁灭就成了这个阶层获得心理平衡的为数不多的选择。所以，造成悲剧的实质原因是法国社会的阶级固化现象，尤其是中产阶级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之间不断加深的阶级鸿沟而发展出的无法调和的矛盾。《温柔之歌》中对路易斯犯罪的思想变化路径的揭露正是对当下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阶级流动受阻现象的严肃警告。

4. 结语

《温柔之歌》开头展现的血腥画面在故事尚未讲述前就已将两个幼童死亡的结局揭示给读者。这一悲惨的结局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主线索，吸引读者去思索保姆弑童的动机。随着情节的演进，路易斯犯罪动机逐渐浮出水面的同时作者的死亡观念也通过其冷静客观的语言和合理化的杀人情节设置清晰的体现出来——社会案件中的死亡是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无法抗拒和避免，只得冷静清醒地面对。具体地说，保姆弑童是其在受到多重压力打击之下精神崩坏后的必然结果。作者首先用不掺杂个人情感的语言描述了路易斯杀人的犯罪现场，体现其像摄像机一样客观对待死亡的态度。其次，在故事进

程中多次明示暗示了路易丝身上也有邪恶的可怖的一面，是有犯罪杀人，造成他人死亡的风险和前兆的。而《温柔之歌》中悲惨的死亡情节与作者对死亡理性的认识正是在呼吁大家思考造成类似的惨案的社会根源。路易丝的仇恨并不是针对米莉亚姆一家，而是针对社会中整个雇主阶层，社会中千千万万个动过杀心的路易丝亦是如此。悲剧的根源恰是社会底层对这个看似富足美好的社会的仇恨与嫉妒。雇主群体与保姆阶层之间经济收入，消费行为，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在今天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加剧，导致阶层矛盾更加尖锐，最终造成了一个个与路易丝弑童极为相似的社会惨案。

项目基金

本研究由广西民族大学2019年度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于翻转课堂理念的法国文学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19XJCY22）资助。

参考文献

- [1] AISSI sara. L'indicible au centre de l'intrigue dans «*Chanson douce*» de leila slimani. [J]. Paris: Université Aboubekr Belkaid-Tlemcen, 2017.
- [2] AZOULAI Juliette. *Flaubert et le débordement de l'ame*, in *littérature et aliénisme au 19 siècle*. [M]. Paris: Presses Sorbonne nouvelle, 2012.
- [3] BENOTMANE Wassila. Le personnage dans le roman «*Chanson Douce LEILA SLIMANI*» [J]. Paris: Université Abdelhamid Ibn Badis MOSTAGANEM, 2019.
- [4] BENSLIMANE Fatima. Les visées de l'écriture de Leïla Slimani dans «*Chanson Douce*» [J]. Paris: Centre Université BEKHADJ Bouchaib d'Ain T'émouchent, 2018.
- [5] BOUDRAHEM Meriem Imen. Maternité et Modernité dans *Chanson douce* de Leila Slimani [J]. Paris: Université 8 Mai 1945 Guelma, 2018.
- [6] Kim W. Leila Slimani: This book is a mirror to make the elite look reality in the face. [R]. The Guardian, 2020-2-16.
- [7] SIRYANI, Isabelle, «Chanson Douce, Leïla Slimani», [J]. La Cause Littéraire, 2017.
- [8] SLIMANI Leïla. *Chanson Douce*. [M]. Editions Gallimards, 2016.
- [9] SLIMANI Leïla. *Comment j'écris*. [M]. Editions de l'Aube, 2018.
- [10] 程毓凝.2017.温柔尖锐的女性之声[J].外国文艺(2): 40-44。
- [11] 李嘉懿.福楼拜虚无主义思想研究：以《包法利夫人》中的死亡意识为例.[M].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 [12] 蕾拉·斯利玛尼.访谈:懂得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反抗.[R].凤凰读书, 2017-08-10。
- [13] 蕾拉·斯利玛尼.温柔之歌.[M].袁筱一，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 [14] 孙利天.死亡意识.[M].长春：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
- [15] 王玉琴.论文学中的死亡意识.[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9。
- [16] 肖华.从小说《温柔之歌》看当代法国社会阶层固化问题.[J].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19. (1): 77-83。
- [17] 袁筱一.路易丝为什么要杀人？[J].外国文艺.2017. (2): 34-40。